

百年回望：新文化运动的破与立

编者按：100年前，《新青年》的创办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：它开风气之先，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；它崇尚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，推动了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；它使民智得以开启，使新文学得以生根，使白话文得到提倡，使知识界风气为之一新。其影响在其后百年仍绵延不绝。在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，《群言》特邀部分知名学者撰文，梳理新文化运动与儒学、与传统、与民主科学等的关系。现将稿件编发如下。

《新青年》的真髓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 郁

《新青年》创刊100周年，关于它的是非曲折，总有不同的声音。有赞其开启新时代之风气者，有讥其终结了传统文化者，观点繁杂，交锋多多。今人诟病《新青年》最多的，是对于儒学的背叛，以为该杂志是现代激进主义的摇篮。不过说到《新青年》对儒家学术的态度，张申府的观点值得一思。他说，那代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，他们反对传统，乃“打倒孔家店，救出孔夫子”。这个看法是那些非左即右的思路所不能有的历史主义态度。

明代以后，对于孔子学说的批评声音很

多，文人针对宋明理学的思考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路径。李卓吾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傅山、俞樾等人对理学的批评在后来被渐渐放大，成为读书人的话题之一。我们看《红楼梦》对于理学虚伪性的表达，能够感受到儒学教义后来的衰微，孔子的真思想多被遮掩住了，或者说走入了歧途。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那代人对于传统儒学的认识并不比曹雪芹高明多少，只是多了西学的参照。“五四”学人从更开阔的空间讨论过去的遗产，并非简单颠覆孔子的思想资源。张申府说“五四”那代人懂得儒学真正的

本质,也并非没有道理。《新青年》讨论旧的文化遗产,认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宜现代生活,这倒是肺腑之言。鲁迅那代人在旧文明衰微之际,从儒气很浓的士大夫之路出离,进入知识分子的王国,儒学的意识被扬弃了,形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。这些,都是开启新风的选择。

晚清之后,儒学分成许多流派,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讲孔子各有侧重,有时并不都在一个语境里。《新青年》同人是懂一点西学的,知道孔夫子自有其不朽的价值,但成为万世师表已再无可能。《新青年》抨击儒教,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有关,说他们的主旨是针对儒学也并非没有道理。这些人在前后几十年间,写了许多谈论儒学的文章,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策略与价值理想。易白沙《孔子评议》、陈独秀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、李大钊《自然伦理观与孔子》、胡适的《说儒》,都是新视野里的学问,就学术眼光看,实在是通透的文明观的外化。民国初建,国民的意识没有多少新的因素,有人以孔子思想立教,成为时尚的话语。孔子学说与民主制度有诸多的距离,是显而易见的,新式文人对此颇有警惕。易白沙认为,孔子学说适用于帝王之术,可谓一针见血。李大钊则以为孔子精神是专制的一种遗产,与今人的思想不符。他在《孔子和宪法》中与陈独秀在《宪法与孔教》里发出的声音接近,以为在现代社会里,用古老的思想作为支撑可能会出现“孔子者,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。宪法者,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。专制不能容于自由,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。”陈独秀也主张,在新的时代,孔子的遗产能够带来的精神安抚有限。孔子学说有长幼尊卑之道,恰与人人平等的法的精神相违。在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一文里,他又从经济的角度切入,认为在经济社会,伦理道德开始不同于过去,孔子学说对

此有无力之感:

现代生活,以经济为命脉。而个人独立主义,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,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。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,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,互相证明,其说遂至不可摇动。而社会风纪、物质文明,因此大进。中土儒者,以纲常立教。为人子为人妻者,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,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。

这种看似极端的看法其实自有道理,是建立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。《新青年》同人对于儒家精神的思考多有学理的支撑,并非人们所谈的那么非理性的表达。“五四”过后,许多学人如胡适、傅斯年、吴虞等人讨论孔子,都有层次,不是一概而论,即便是钱玄同这样的人物,言古代的孔子与现代的儒学也是有言论的边界在的。孔子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,但他的思想不能教今天的人们,这大概是“五四”思想家的共同看法。在这里,胡适《说儒》似乎具有代表性,他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为孔老夫子的价值作了新式的判断。

《说儒》旨在还原儒是什么,而非陈独秀所云的不是什么。胡适从章太炎的思路受到启发,又参之新史学的资料,把儒家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的梳理。在胡适看来,儒不过是殷的宗教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,是治丧相礼的职业,属于远古精神生活的表达者与体现者。孔子的贡献在于,“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‘仁以为己任’的儒”,“把柔弱的儒变到刚毅进取的儒”。在这个过程中,胡适发现了儒自身的变化,以及孔子与老子精神交叉的地方,其有限性和优长都浮现出来。我们看胡适的梳理,康有为、谭嗣同那样的崇高感就被一种科学的、历史的精神所代替。在他眼里,孔子的遗产自有非凡之处,但只可作学说视之,不可当信仰为之。《说儒》的历史主义眼光,其实为解释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标本性的表达。

在胡适笔下，孔子的不凡是顺应历史潮流，在殷代文明远去的时候，能够据周代的文化有变革地选择，把一个古老的遗风嫁接到新的时代里面。将其视为一种旧文化的起死回生，也不无道理。胡适这样解释儒家遗产有内在的用意，即为新文化的产生辩护，而在根本意义上说，“五四”新文化其实也是孔子式的使命的一种展示。较之于同代的激进主义文人，胡适对于自己的使命的认识是有历史的逻辑的。

当孔子学说以自然的、逻辑的方式与今人相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给予他一个客观的位置。这是“五四”新学人几乎相似的看法。但问题在于，民国之后，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儒家被权力者再次利用，成了统治术的时候，“五四”新文化的参与者不得不发起批判的运动，抵抗千百年来形成的孔子的传播方式。这抵抗有学理的方式，有艺术的方式，新文化的产生是摆脱孔子遗产的一次精神反动，就深入性而言，也可视为千百年来罕有的革命。新文化的新，就是与儒家审美精神与道德伦理拉开距离，没有这个距离，文明的进化一定是空话。

儒家思想的伟大需以超功利之心静思，方可得其妙意而用之。西洋哲学史家看见《论语》叹其不差于耶稣、释迦牟尼，都是从思想史的格局里思考的结果。但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精神定于一尊之后，出现了几个问题。一是与统治关系密切，被纳入治人之术之中。二是成为科举的内容，被强制推行于教育领域，其有趣、自然、人道的温度消失了。《论语》远矣，儒家的秩序则越发森严。孔子成了牌位的时候，人们对于其内心真的形态反而渺忽如云烟般朦胧起来。

鲁迅对儒学的负面看法与其早期记忆有关。在少年时代，儒家教育提供的价值符号不能满足他内心的需求，那些成人的礼仪和教训

恰和孩提浪漫、天真的思想相反，让好奇的孩子变得老成与世故，且匍匐在古老的幽魂里，续唱着殷周的调子，鲁迅感到了某种滑稽。

儒家教义，需成人慢慢可解，对于儿童，有压迫的感觉无疑。从教育学的角度看，《论语》适合十几岁后吟诵，童蒙则不知所云。以鲁迅的自身经验而论，早期吸引他的是儒之外的存在，比如《山海经》、《花镜》这些不讲礼仪的有奇异想象力的存在。在《论语》那里，刺激人幻想的东西殊少，精神自然不能起飞。孔子的学说叫人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但关于如何释放精神之力、具有想象与创造的快慰就少得可怜。

孔子不能唤起鲁迅快慰的还有一点，对于奴性很强的国民如何变成一个真人，大概也没有什么真力在。按照孔教的思路，人越发变得虚伪则是可能的。《二十四孝图》给鲁迅的刺激就在于让孩子在一种反人性的选择里去适应生活秩序。他将其视为罪恶的存在也并非夸张，《朝花夕拾》的主旋律是偏离儒教的歌吟。读懂了那些礼仪制度里的一切，我们才能明白新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是多么重要的选择。

儒学本来很有人性的遗存，待礼教出现，就与孔子本意相去甚远了。这原因是儒家教义含有尊卑之意，它有走向人性相反的一面。当社会充满不公、灰暗和绝望的时候，儒家精神不可能使受难者获得自身的解放。受了伤害的人再用《论语》的遗训处世，则有大的不幸，沦为奴隶的可能甚矣。“五四”后，鲁迅在《灯下漫笔》中说：

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，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辱，但也可以凌辱别人；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，也不想动弹了。

这是儒家思想给予后人的馈赠。其实不独儒家思想本身，而是专制制度下对于儒家思想

的利用导致的精神的衰败。鲁迅知道，自己这一代面临的是对于这些存在的清理工作，无论写作还是翻译，他面临的都是如何绕过儒学，开辟人间新境的选择。

从知堂的回忆录可知，鲁迅的趣味一直在儒家之外的世界，或者是儒家旁边的有意味的诗文、图画。他很小接触《尔雅音图》《山海经》《芥子园画传》《天下名山图咏》《点石斋丛画》《诗中画》《荡寇志》《唐代丛书》等。那些感性的，有着一丝趣味的作品书籍，教他识字、察世、知理、达情，有了阅世的启蒙。他后来看到外国的儿童文学之发达，艺术的多样，就感叹中国说教理念的陈腐。孔子的学说不是不好，但能够实现的寥寥，不免一纸空文。历代束之高阁的时候居多，指导人生则难矣哉。我们看鲁迅笔下的乡村，儒家的东西都不免被虚伪化了，在森然的等级制下，人的自由、快慰统统引退。等级制没有人性，百姓只能忍受宰割。《呐喊》的许多篇目写出了这类问题之严酷。

鲁迅对于孔子的看法不都是漫画式的。在议论文里，他知道哪些值得肯定，哪些是虚妄的存在。而在小说作品里，言及儒家传统就不免夸大和变形之处。他称赞孔子在巫气盛行的时代偏偏不信鬼神，实在是不凡之举。而在艰难里能够有韧劲，也非常人可及。不过，鲁迅眼里的儒家，负面资产多于正面资产，这是后来中国的环境所致。在复杂的环境里，孔子学术被另一种话语所叙述，变成了统治术的一部分，在他看来恰是儒学的缺陷之一。

王得后《鲁迅与孔子》叙述鲁迅思想的逻辑点与孔子逻辑点的不同，可参考的观点很多。他认为，鲁迅看人的价值从生命意识出发，有达尔文的遗绪，也带着科学主义的成分，看到人的有限性。王得后认为，孔子在人的长幼尊卑中建立道德秩序，鲁迅则在立人中寻找

精神成长点。而根本志向上，他们的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不同。这都很贴切。导致鲁迅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同的缘由，是现代人的生命感觉和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逻辑路径发生冲突。这既有李大钊、陈独秀所说的原因，也有胡适所说的原因，但在根本点上，鲁迅的生命意志里有一种逆儒学的因素存在，这衔接了西洋的人道精神，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传统的态度。

在儒学的传播史里，中庸、仁义、责任都是核心之所，思想中有厚重的东西在。可鲁迅觉得，思想的提升乃精神创造的过程，而这个过程中，中庸自然不成，它让人安于平衡，那就只能在熟悉的路径上徘徊。人间之事往往是这样的，在陌生的穿越极限之中，才有新路的可能，儒学把人的创造性限制住了。《论语》对已知世界的描述精矣妙矣，可不能提供对未知世界的认识，此为鲁迅不满的原因之一。仁义是重要的思想元素，但是如何对待恶的世界，直面黑暗的世界，仅仅有温柔的东西不够，孔子的观点易流入无为的说教，此鲁迅远离儒学的因素之二。在责任上，孔子对人与己作了诸多说明，使命感与道义感都有，但策略乃为君王的策略，与百姓的关系不多，沦为奴役之路，此鲁迅不满儒学者三。我们要是在这三个层面讨论鲁迅与儒学传统，自然能够发现古今思想家路径变异的逻辑过程。

讨论新文化运动，《新青年》同人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，都有特定的指向。我们如果细细分析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的文本则可以看到，他们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真人。传统文化的价值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，而是启示后人不断开创新的精神秩序。也就是鲁迅所云：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。”这才是《新青年》同人思想的真髓。